

一、生平简介

滕伯祥，南宋时姑苏吴县名医，生卒年不详。《吴中名医录》谓滕氏“宋庆元年（1195～1200年）吴县人”，似乎可理解为滕氏出生年的区间。滕氏所著《走马急疳真方》是我国现存治疗口疳最早的一本专著，其内有滕氏的自序。

滕氏所序时间是“德佑元年岁次乙亥孟夏吉日”，德祐为南宋恭宗赵显年号，德祐元年为农历乙亥年，即为1275年，序中言“迨今吾年八十余矣”，由此推算滕氏出生年应该在1195年左右，这与《吴中名医录》所说基本相符。然而与序中“宝庆改元，吾时年二十八”相参，宝庆为宋理宗赵昀年号，宝庆元年农历为乙酉年，即1225年，古人所言年岁多为虚岁，估算滕氏出生年应为1198年左右，两者相差两三年，难以确认具体出生年。我们将滕伯祥的生卒年定为：约生于1195年，卒于1275年后，具体年月有待今后发掘更多的文献资料来确证。

滕氏家族以诗礼传家,祖辈并无什么官职,其父十六岁时就离世了,滕氏“早孤失学无闻,唯谨是持,而唯善是务耳”。直至有一年滕氏在拜祭先祖墓茔时,遇到一长者,“貌古而奇,气舒而泰,风度飘飘,精神落落”。长者问滕氏你是一个善良人之后,为什么不读书呀?现今你虽然与权贵无缘,但我可以让你富起来。滕氏听闻此言大为惊讶,感觉到老者不是一般人。当时滕伯祥还没有子嗣,心想富贵与我何干?还不如向老者求得子嗣。长者很感慨滕氏不以富贵为求,说会满足他的愿望的。于是长者拿出一本书给滕氏,说:“愿子将此多济人子嗣,则子子嗣必多矣。”忽然间长者就消失不见了。此书就是《走马急疳真方》,滕氏得此书后,“按方精修合,施于人,果甚奇验,百发百中”,后来自己还真有了子孙。

此段记述虽然是滕伯祥在《走马急疳真方》自序中所言,传说的成分显而易见,但宋元时期幼(儿)科已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专科,滕氏擅长幼科是不争的事实,其子孙世传其术,多有医名,《走马急疳真方》也流传甚广,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元吴县儿科世医徐仲芳,青出于蓝,诊治小儿疾病谨慎细心,处方给药精良,常乘一驴出诊于烈日狂风黄尘之中,宅心仁义,众多患疾稚婴正赖其回春妙手而转危为安,正是得益于滕氏之医学。

二、生平史料

关于滕伯祥的史料记载可见于崇祯《吴县志》卷 53,人物 19,方术;乾隆《吴县志》卷 76,人物,方术;民国《吴县志》卷 75,列传,艺术 1 等,虽寥寥数语,亦弥足珍贵。

《吴县志》庆元间,为人乐善好义,遇孤贫婚嫁与丧葬者,多为代举,乡党称为滕佛子。尝出郭遇至人,得小儿疳,因以为业,令其子孙尤不替所传。(崇祯《吴县志》卷五三“人物十九·方术”)

《走马急疳真方》序 吾滕氏,自唐迄今六百余年,科第联芳,簪纓相继,诗礼传家,清明持守,至大父举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不仕,蒙赐号廉静处士。吾父国学进士,亦是科,年一十六而奄弃,独遗不肖,早孤失学无闻,唯谨是持,而唯善是务耳。宝庆改元,吾时年二十八,仲春具牲醴,诣墓拜扫封茔,途遇一老叟,貌古而奇,气舒而泰,风度飘飘,精神落落,顾吾若欲与语者,以是趋进长揖,叟执吾手,笑而谓曰:子善人子也,何少读书耶?今虽不得贵,亦当致子富也。吾卒然感而思之,富贵果人心之所爱者,然吾向乏嗣,不若以此为请于叟乎。于是敬上白焉。叟曰:子既不以富贵为欲,而

以子嗣为欲，宜乎。吾当以子寿。继而出受一书，嘱曰：愿子将此多济人子嗣，则子子嗣必多矣。使吾向日拜，起而叟遂失焉。骇感良久，谨捧书归，焚香开读，乃治小儿《急疳走马真方》也。按方精修合，施于人，果甚奇验，百发百中。未几生珪，长仕吴江州司训，珪生清。迨今吾年八十余矣。噫！叟之言，神且信也，其书敢不敬乎！乌可易而视之哉？是用识于篇首，示吾子孙当保是书，而精修药饵，惟以济人为心，不以利为心可也。德佑元年岁次乙亥孟夏吉日乐善老人南阳滕伯祥撰。（《走马急疳真方》自序）

三、著作

《走马急疳真方》临诊类著作，不分卷，又名《走马疳真方》、《走马疳治疗奇方》、《走马疳急方》，成书于德佑元年（1275年），多见抄本，有1993年上海中原书局铅印本，《三三医书》第二集载录是书。

《三三医书》在本书的提要中言：“疳、癆、鼓、膈，为杂证中之四大重病，素称不易治疗，至疳证中走马牙疳，尤为措手不及，常见早发夕死，所以有急如走马之喻。然吾国古时，越是急证，越有灵方，惜为医生口口相传，所谓传媳不传女，秘之秘之，以致失传。近来西医之研究古方者，很注意此种失传之秘方，洵足钦佩，本书即其一种也。记为滕氏所秘，观其药，皆隐名，可以知矣。裘君特将重值觅得之藏稿印行。”

《走马急疳真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治法”，第二部分为“药方”，第三部分为“药品异名括”。“治法”部分包括治口疳、治发痘疹生疳、治耳聾内生疳、治胎毒头疳、治头面手足遍身疳疮、治大人遍体生疳、治下疳、治五脏疳之法等九段文字，概述了走马口疳的辨证、内治、外治及食忌等内容，叙述条理有序，简洁清楚，重在实用。“药方”部分载方共十七首，分别为紫金散、绿袍散、二圣散、立效散、鹿儿膏、茅君散、十仙丹、二妙丹、二黄散、冰黄散、消毒散、甘露饮、消疳丸、保童丸、肥儿丸、圣饼子、兰香散，各有主治侧重，且每方下载有歌诀说明主治及组成，类似现在的方剂歌诀。由于书中所载药物全为隐名，所以在“药品异名括”部分就以歌诀的形式将隐名显示出来。

四、学术思想

1. 阐述治口疳之法

《走马急疳真方》重在口疳的治疗，滕氏首先论及了治口疳之大法及具体方法。如：“凡治口疳，必先以压舌，压定其舌，以杖子挑起上腭，务细观其咽喉中有无，次及上

下、舌底、齿根，如有紫肿处，用三棱针刺出毒血，或有黄泡烂肉，以青生绢裹指，蘸新汲井花水，拭擦去净，用二圣散干敷患处，以消毒散生蜜调和后食后服用。若疳延于上腭，用绿袍散敷之，毒涎从其流出，或咽下亦不妨。或用圣饼子贴于足心，男左女右，以帛扎定。如延及咽喉，用药筒纳紫金散吹入，治以甘露饮，煎，食后。倘有黑烂恶肉，攻成潭穴者，为至重之症，须以刀取去恶肉，但不知疼痛者，不可治矣。若觉痛，速以紫金散敷之，以甘露饮加皱面还丹浓煎与服，庶几得生。”又如：“凡治胎毒头疳，脓血满头，腥臭滋水淋漓，或痛或痒，延及肢体者，先以米泔水煎二妙丹，去渣，令温洗之，无风处拭干，再用鹿儿膏加茅君散，香油调匀敷之，内服肥儿丸。乳母忌食辛热发毒之物。如鼻疳，用兰香散干敷。”

2. 治疳须辨证

滕氏以为对于疳证并非见疳治疳，治疗时需要辨证（症）灵活应用的，更需要忌一些发毒、动风、辛热之品。如：“凡治头面手足遍身疳疮，先用米泔汤洗之，再以猪油调十仙丹敷上。若痒，加二妙丹。痛不必加。内服肥儿消疳丸。均可忌一切发毒、辛热之物。”“凡治下疳之法，须审内发外染二种。内发者，自父母稟体所遗，根柢甚深。外染者，衣服不洁，传染而得，病尚肤浅……忌口如前列诸般发毒、动风、辛热之物。”“凡治五疳之法，须辨新久、冷热。若疳之新者，为热疳，则面黄脸赤，骨热盗汗，鼻干口臭，唇焦烦渴，心躁惊悸，情意不乐。若疳之久者，为冷疳，则目肿腹胀，便利不定，泻粪肥腻，或似油珠，烦渴黄瘦。热疳病多在外，冷疳病多在内。又有冷热二症交互，非新非久，不内外因者。然初病肥热，久病瘦冷，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任寒温，服寒药则生冷，服温药则生热，当识此理，以为治疗之纲领。”因此，滕氏言：“疳之为病，名状固多，而治疗之方亦不少，惟消疳丸、保童丸二方治五疳，品味平和，用之稳当，量儿大小、新久、冷热、虚实，以意消息增损与服，得效如神，是用表而出之。”

3. 列举治疳药方之侧重

《走马急疳真方》共载有十七首治疳药方，又有从外敷治和煎药内服之别，各方均有侧重。如紫金散、绿袍散、二圣散三方虽组方不同，均“治遍口生疳，作秽臭烂，延及咽喉，败坏甚速，故名曰走马疳”；立效散“治脐内生疳肿胀，脓血臭秽”；鹿儿膏“治胎毒头疳，脓血满头，腥臭滋水淋漓，延及肢体，或痛或痒”；茅君散“治湿毒疳疮”；十仙丹“治头面手足偏身疳疮”；二妙丹“治痒，杀虫，去湿”；二黄散“治痒，杀虫，去毒。小儿药中勿用”；冰黄散“治下疳”；消毒散、甘露饮“治湿毒口疳”；消疳丸“治疳生于内，面黄腹

胀,潮热,便浊腹疼,及虫痛羸瘦”;保童丸“治五疳”;肥儿丸“治疳瘦,进饮食,健脾胃,杀虫积”;圣饼子“治走马急疳,用此能拔毒”;兰香散“治鼻疳烂”,等等。

4. 走马疳今义

目前普遍认为走马疳是一种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是由于营养不良和以口腔卫生不良为背景的传染性疾病。最常见的营养缺乏为维生素、蛋白质缺乏和缺铁性贫血症。其发病倾向于细菌感染性疾病,尤其是急性坏死性溃疡性牙龈炎是走马疳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常见的致病菌为厌氧性梭形杆菌和螺旋体等,多在小儿患麻疹、水痘、痢疾等急性传染病 5~7 天后,因治疗不及时、不彻底、营养不良、室内通风不好等因素诱发。对于全身抵抗力极度低下的恶病质病人或者重度营养不良的儿童,可并发感染荚膜杆菌,使感染区迅速坏死,甚至组织穿孔呈黑色腐败,故称走马疳。

走马疳多发于幼儿,成年人病例极少。起病较急,病程短,病情发展快,可迅速使全身衰竭。症状主要有口腔疼痛,口内有腐败恶臭,牙龈出血,上下唇及口角两侧发紫、发黑、变硬、坏死,继之牙齿脱落,牙槽骨及颌骨发黑、坏死、腐败。口腔颌面部软组织、颌骨、牙齿、鼻唇部可在发病后 3~5 天迅速坏死脱落,牙龈坏死溃疡形成,牙间乳头消减,有腐败臭味,局部出血,唾液黏稠混有血液,有剧烈疼痛和持续性钝痛,口腔黏膜多处可有不规则形坏死性溃疡。重者局部缺损和畸形。口腔分泌物和坏死组织涂片镜检有大量梭形杆菌和螺旋体,甚至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病人不去医院,死亡率极高,约 80%,大多数患者死于败血症。幸存者忍受着毁容和很常见的功能性后遗症的双重痛苦。组织瘢痕妨碍颌骨运动,而且组织丧失不仅限于软组织,病损可以侵犯到邻近的骨组织引起上颌骨、下颌骨,甚至其他面骨缺损。幸存的儿童永远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样进食和说话。

1992 年 11 月,WHO 和国际牙医辅助会以及许多个人与学会在巴黎召开了会议,提出一项控制走马疳的五点计划:预防和早期发现;急诊保健服务;病因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在其他国家治疗后遗症;在西非建立一个非洲区综合医疗中心。

走马疳目前一般是治疗为:① 抗感染治疗,控制急性炎症,应用抗生素抑制病菌蔓延。给予大剂量的青、链霉素,灭滴灵,维生素 C、维生素 B₁、维生素 B₂;② 全身支持疗法,以增强其体质和抵抗力,及时补足液体,加强营养,少量多次输血,进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易消化的流质饮食;③ 局部经常清洗,保持创面的湿度,对脱落后的创面及时涂甲紫液,必要时适当地切除坏死组织;④ 创面愈合后,做整形手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走马疳在我国已较为少见,尤其是抗生素的发现和使用,使本病大多消灭在萌芽状态。滕氏在数百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走马疳的危害,且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令人叹为观止。进一步挖掘整理《走马急疳真方》所载方剂,对拓宽类似疾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显示意义。

参考文献

裘庆元.三三医书(第二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马一平.宋元时期吴中医学的发展和成就[J].中医药文化,2009,(2):29~31.

安武根.走马疳病[J].家庭医学,1998,(3):23.

谷胜东.口疳专著《走马急疳真方》[J].中华医史杂志,2002,32(7):144.

世界卫生组织专稿.走马疳,一个鲜为人知的公共健康问题[J].中国健康教育,1994,(12):17~18.

一、生平简介

薛辛，字将仕，号古愚，昆山县（今玉山镇）人，生卒年代未详，南宋末著名的妇科医家，《女科万金方》一卷为其代表之作。昆山郑氏、宁波宋氏、海宁陈氏和绍兴钱氏并称江南四大女医科，薛辛即为昆山郑氏女科世医的始祖。

郑氏祖籍河南开封，系周宣王弟友（郑桓公）之裔。先代累世策名仕籍，多不胜数，王侯卿相，蝉联栉比。第六世郑氏为宋徽宗之显肃皇后，第七世郑居中为宋太保、燕国公，追封华原郡王。郑居中次子忆年（宋政和八年进士、资政殿大学士）于建炎三年率家百余口随高宗南渡，定居昆山，建第县城通德坊，遂占籍昆山，为迁昆始祖。

薛辛精于医术，尤擅女科，治多良效，名闻遐迩，人称薛医产家。因无子嗣，传医术于女婿钱民。钱氏复传医术于婿郑公显，郑公显为郑忆年五世孙，自后郑氏家族乃累世业医，专精女科，代代相承，历二十九世，无有间息，迄今已有近八百年的悠久历史，堪与江南何氏二十九代世医相媲美，成为中外医学史上罕见的奇迹。

薛辛集一生之心得撰写了《女科万金方》，其后代将薛氏的《女科万金方》奉为私

密,私相传抄,八百余年,从未付梓。其手抄版本亦以两种形式流传,一种是未经改编本,此类抄本基本保留原作内容,或者增删的内容不多,字数约在三万字左右,仍以原书《女科万金方》命名。另一种是在原作基础上由郑氏的后人逐代添加内容的抄本,即改编本。此类抄本的书名有的一仍其旧,如上海中医药大学馆藏的清代郑氏二十六世孙郑隆祚抄本,虽取名《女科千金方》,然而字数已有近十四万字之巨了。

薛氏《女科万金方》以抄本传世,绵延八百年,在中医药家族抄本中独树一帜。以《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及《中国医籍大辞典》有关记载为线索,目前确定国内各大图书馆馆藏郑氏女科抄本为十九种,三十八部。除《女科万金方》外,还有《郑氏家传女科万金方》、《坤元是保》、《女科济阴要语万金方》、《女科万宝方》、《薛氏济阴万金书》、《玉峰郑氏女科秘传》、《妇科胎产问答要旨》、《家传产后歌诀治验录》、《产家要诀》、《产宝百问》、《郑氏女科集义》、《妇科药囊万金方》、《女科宝藏神书》、《胎宝百问》、《坤道指南》、《郑氏女科八十一治》、《郑氏女科真传》、《郑氏医案》等,都可以视作《女科万金方》的改编本。其中《女科济阴要语万金方》与《坤元是保》二书是郑氏女科抄本中代表性的著作。这些抄本的抄写年代,除崇祯本外,其他均为清抄本和民国初期抄本。而且由于多为海内孤本,各地馆藏视为珍秘,绝不轻易示人。

这些医著名称和编著者虽各异,但其内容都比较接近,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用问答、歌诀形式论述妇女经、带、胎、产的正常生理、病因病机和诊治方法,另一部分则分门别类地汇总有效的家传女科良方二百多张。这些医著,乃薛将仕传授女科医疗经验与处方,经郑氏历代后裔不断增益修改整理而成,然仍署“宋薛将仕撰”,或“宋薛古愚撰”,或“宋古愚薛将仕撰”,为遵祖之礼。这些抄本所谓的成书时间亦不太可靠,作者托名,写作时间亦必托古,正如已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经考证后,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指出:《女科万金方》开宗明义第一章引东垣云云,则宋未必无其人,作者必为后人依托无疑。

这些医著虽然托名、托古,但它们确是郑氏世医们长达二十多代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确实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清张璐在《张氏医通》卷十、卷十一中也引用了许多《万金方》的内容,尤其是对产后三审、九禁等论述较为详尽,也足见《女科万金方》的学术成就及在各医家中的影响之广。

二、生平史料

薛辛的生平在《昆新两县续补合志》等史料中略有见载,未见于《宋史》等史籍,多

见于郑氏女科所传的著作等序言或记述中。

《昆新两县续补合志》薛辛，字将士，号古愚，佚其名。得外家郑氏带下医方，传钱氏，钱复传于郑，郑世世业焉，至今村民与邻封之人皆呼郑氏为薛医产家。郑文康有“薛将仕祠堂记”，其墓在一枝园旁板桥巷侧张浦，遗闻以将仕为才女兰芳、蕙芳之父，恐不足据。

钱氏，名字均佚，南宋末昆山人。得岳父薛将仕传授女科医术，业医。（民国·李传元等《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十四“人物·艺术补遗·薛将仕传”）

《平桥稿》将士姓薛氏，宋季人，吾祖宗。旧题其主曰：外祖薛三十将仕神主。盖三十疑是行，将仕疑是官价。或曰宋人多以双数加诸名字之上，以承事朝奉之类，为通称，则三十与将仕又似非行与官价。将仕善医产，钱氏初得其术，吾郑氏又从钱氏得之，至今昆山村民与邻封之人，直指吾家为薛医产家，不知久为郑也。将仕之术之神，在当时可知。自祖宗来传习其术二百年，虽有春秋二祭，以报遗泽，窃虑姓氏再易，精神不能与之流通，欲计其远且大者为之。岁癸酉，侧室潘娠弥厥月余，小子拜舞，告将仕曰：幸男当嗣公。已而达然果男，愚意将仕在天之神必默受之。因名曰受，今已七年矣。知觉日生颇能拜跪，余欲委领岁事，乃立薛氏祠堂，易书其主外祖。（明·郑文康《平桥稿》卷六“薛将仕祠堂记”）

《昆新两县志》郑公显，宋末元初昆山人。南宋资政殿大学士郑亿年五世孙。因祖、父官，荫从政郎，然而潜隐不仕。得岳父钱氏传授外祖薛将仕女科医术，日检方书济人，遂擅名于时。郑氏累世业医，皆自公显始。（《昆新两县志》卷四十“杂纪·郑公显传”）

《女科济阴要语万金方》郑氏本宋仁宗后侄，忠益王之裔，居玉带河之北，薛氏居玉带河之南，其南北对面俱岑楼，薛无子只一女，郑习儒，亦只一子，薛女与郑子隔河相望，两意目送，遂以通情……遂配为夫妇，其后郑之子孙遂得薛之秘书而专女科，故云薛医产，不忘本也。（《郑氏秘受薛医产万金方》之“郑传薛医产源流”）

《产宝百问》郑氏南渡始祖，南渡后卜居于越，一日游至昆山，偶于古愚药室中坐以节劳，古愚视其容貌魁梧，动静不群，询尚未娶，遂招为婿，古愚为邑中世肇，居平桥南堍下，专门医产，名震东吴，始祖不觉欣羨，弃儒习医，得传斯业，奕世相承将五百年矣……赐进士介庵郑文康谨识。（《产宝百问》之“郑氏受薛氏医产源流”）

三、著作

《女科万金方》 妇科类著作，一卷。成书年代无考，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是明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抄本(后简称“崇祯本”)，该版本已制成缩微胶卷，原书疑藏台湾。另外较早的版本有苏州大学馆藏的抄本(后简称“苏大本”)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馆藏的抄本(后简称“黑中本”)。

崇祯本乃目前国内的最佳版本，不仅早于其他抄本，而且内容与他本比较更为简约，更接近薛氏原作。2015年鲍晓东、方正以崇祯本为底本，苏大本和黑中本为主校本，南京中医药大学馆藏的《郑氏家传女科万金方》为参校本，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女科万金方》，也为笔者著录本文时的蓝本。

是书不分卷，书开始列“万金方歌诀”、“受胎总论”、“转女为男法”、“产后调理法”、“诸经问答”、“调经十五论”、“十月胎形论”、“胎前问答”、“产后问答”、“产科总论”十论，中间列“中风门”、“伤寒门”、“积热门”、“诸湿门”、“诸气门”、“诸疟门”、“泻痢门”、“脾胃门”、“咳嗽门”、“虚劳门”、“疮肿门”、“诸经门”、“血淋门”、“胎前门”、“产后期”、“杂症门”十六门妇科疾病证治，再后列“薛古愚加减方”、“种子方”、“升精法”三种方与法，最后附“调经歌诀”。是书详尽论述了妇女在经、胎、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常见病和疑难杂症，医理简洁精辟，经验丰富老到，处方简明。

四、学术思想

1. 女子性缓为上，安康经准为先

女性一生以血为先天，故多耗血伤阴。血虚则气升，阴虚则火旺，故女性往往阴火易盛而性情最易波动。《坤元是保·薛轩序》(宋代抄本)曰：“妇人一科，古人称之曰难。爱必溺，憎易深，意最着，情实偏。牵恋生忧，憎恶蓄怨。嗜欲过于丈夫，感伤倍于男子。心结不散。此数者，病之根也。”

薛氏有鉴于此，故在《女科万金方》开篇伊始“万金方歌诀”中明确指出：“大凡女子，禀受偏执。若欲无病，先戒性急。或为怒气，或为忧郁。忧郁生痰，痰凶火至。恐至伤血，血因火至。怒气伤血，血伤失色，或为疼痛，或为淋疾。”由此可知，薛氏认为性情急躁是女子百病之先，由此而生痰生火，最终会进一步伤血失色，导致月经的紊乱。所以“产科总论”中说：“经至，切须戒气，否则成癥癖之疾。”

女子只有月经正常,才能保证安康,所以薛氏在“万金方歌诀”中又说:“若欲无病,月水安正。月应乎天,水应乎地,一月而来,如期如信。”正是因为女性日常最易犯的失误是情志失调而致月经紊乱,所以薛氏认为调理月经为女科的要务。故其在“产科总论”中曰:“凡妇女诸症,皆当以调经为先。”

既然调理月经为女科的第一要务,而女子的月经有经期、经量、经色和经质的不同,那么什么是薛氏调经最重要的一环呢?薛氏把调理月经的着眼点放在了经期的准确之上。他在“万金方歌诀”中说:“经行贵准,或参于前,或落于后。参前为热,落后为寒。热多清凉,寒多温助。血实血虚,或攻或补。”

2. 调经四物为本,行气香附莫属

薛氏女科,调经贵准。月信若准,一要充盈,二须畅达。血虚血实,或寒或热,皆致经病。薛氏遣方用药,皆赖四物一方。《医方考·妇人门》卷六阐述四物汤药性时谓:当归辛温能活血,芍药酸寒能敛血,熟地甘濡能补血。当归入心脾,芍药入肝,熟地入肾,乃川芎者,彻上彻下而行血中之气者也。由此可知,四物汤乃补血行血之圣方,大凡月经不调,初始用药,不离四物,此乃薛氏女科之通例。

薛氏在“胎前门”中说:“四物汤治胎前产后一切血气之疾并调经。”在“产后总论”中又说:“凡妇女之病,以四物汤为先。盖妇病不过血虚、血热、血冷所致,而四物者,调和血之药也,故以此起剂。”可见薛氏认为但凡女科之病,尽管有经带胎产之分,然都是阴血失调所致。四物汤则专为此而设,故薛氏将此方作为治疗女科疾病的首方。甚至在“胎前门”论述孕妇安胎,针对其人腹微痛,或腰疼,至五六个月当服丹溪安胎饮,其方就是四物汤加人参、白术、砂仁、陈皮、紫苏、黄芩。

《女科万金方》一书阐述调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调经十五论”中,其中论述了女子从十五岁月经初潮到五十岁经水枯竭,治疗各种经病共十六方中,含有四物汤的药方竟然有十二方之多。可见薛氏对但凡月经不调之证,治疗开方都离不开四物汤。

薛氏以四物生血行血,血虽充盈,然而血滞血瘀,经行仍不能畅通。因而薛氏对于复杂而顽固的病情,必用调气一法,而调气则必有香附一药。薛氏在“产科总论”中说:“妇人内外伤风、伤寒,与男女同药。但胎产异耳,四物汤不可无,调气香附不可缺。”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调经十五论”治疗月经不调的十六方中,每张药方都离不开香附,由此可见薛氏调气对香附一味的倚重。

3. 注重十月胎形,强调调理肝脾

养胎的理论肇始于《金匱要略》,仲圣首创分经养胎之说。《金匱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论妊娠伤胎,提到七月太阴养胎之说:“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分经养胎之说突出调理肝脾的理念,可以说是《金匱》妊娠用药的一大特色。

尽管仲圣未能详尽阐发分经养胎之说,但是王叔和则承其后而尽其详。其于《脉经》卷九曰:“妇人怀胎,一月之时足厥阴脉养,二月足少阳脉养,三月手心主脉养,四月手少阳脉养,五月足太阴脉养,六月足阳明脉养,七月手太阴脉养,八月手阳明脉养,九月足少阴脉养,十月足太阳脉养。诸阴阳各养三十日活儿。”

然而突破仲圣分经养胎的藩篱,根据孕妇整个孕期气血的衰旺、胎儿的异常,从孕妇的身心健康、饮食调节、身体锻炼到药物调理,提出一整套完整理论的要数北齐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法》。他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薛氏的《女科万金方》也深受其影响。

薛氏养胎的重点不是“务虚”,而是“务实”。所谓“务虚”,是指薛氏的养胎观并不强调从孕妇的身心健康、饮食调节、身体锻炼等方面入手,而是在徐之才药物调理的环节上进行充实提高。提出了区分十月胎形,用药调理肝脾的“胎形调理法”。从此体现他“务实”的过人之处。

举例来说,一月胎形有如草上露珠,未入子宫深处,尚在“裨户”表浅之处。此时孕妇气血未旺,冲任不固,“常有头晕、恶心、不思饮食,六脉浮紧”之症,亟当补脾益气、补血养肝以固胚胎。薛氏以罩胎散治之。罩胎散以当归、白芍为君,补肝血,益冲任,养胎元;以枳壳、砂仁为臣,补脾胃,固摄养,生化源;川芎为佐,活血理气;甘草为使,调和诸药。诸药共奏调和肝脾,养胎固元之功。

又如十月胎形,此时“胎形满足,四肢开绽,方许降生”,薛氏以催生神圣散治之,认为:“怀妊十月足者,无胀痛者可服。连日未产者,加牛膝二钱;痛而急坠,则入大腹皮八钱;欲产不产而无痛阵者,血虚,则加白芍药、川芎、川归尾、红花各一钱。”而对于难产者,“三日不下,宜服破血行经之药。俱无效,余制一方:以车前子为君,冬葵子为佐,枳壳为使。已服午产一男,众医皆以为奇”。薛氏将此方命名为催生神圣散。

纵观薛氏十月怀胎的“胎形调理法”所属的十张药方无不体现调理肝脾的核心理念,只是二者有所偏重而已。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薛氏的“胎形调理法”吸收了仲圣《金匱》的调理肝脾以养胎元的核心理念,又融合了徐之才逐月养胎的观点,独树一帜,另

成一家。

4. 产后先理恶露,然后补血升提

薛氏治疗产后病具有独到的经验。他认为孕妇产后尽管气血衰亏,但是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恶露不尽而未遑补益气血。“万金方歌诀”有云:“新产之后,先理恶露,后当补血;补血太早,恶不能除。”如果不能及时地去除恶露,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导致气血逆乱而危及产妇生命。“产后调理法”:“凡初产下,不问是男是女,先将醋磨墨三分服之,破凝结之血,然不可太酸之醋。产后三日内,令产妇常闻醋炭之气,或烧旧漆烟,或烧旧漆气,如此可免血逆、血迷、血晕之患。”

《女科万金方》中有的药方就是针对产后恶露不能及时有效地清除从而导致产妇气血逆乱、神志昏糊的,而且这些药方的组方原则只突出一点:破血逐瘀。如“产后门”中有醋煮散,主治产后胎衣不下,血闷冲心。用三棱、蓬术、官桂、赤芍、香附、乌药、甘草等温经破瘀,如果药力不足,恶露较多,另加红花、当归、青皮等行气化瘀,这就是很好的明证。

尽管产后当以行血破瘀、去除恶露为先,但如果产妇气血亏虚明显,薛氏还是强调要攻补兼施。在这样的情况下,薛氏通常喜用七珍散来主治产后虚弱,败血闷心窍,神昏不语。其在“产后总论”中说:“败血冲心、冲胃,二病皆危。冲胃则饱闷恶呕,冲心则癫狂错乱,虽药难治。产后不语者,败血迷裹心窍也。用七珍散,一些不须虑。”在“产后门”中也说:“心有七窍七毫,产后虚弱,多致停积败血,闭于心窍。心通于舌,心气闭塞则舌亦强矣。宜服七珍散。”七珍散方用人参、生地大补元气,滋养阴血;川芎、细辛、防风行气活血;辰砂、石菖蒲宁神开窍。

恶露除尽之后即当议补,薛氏喜用四物汤加减以补血。如“产后问答”中说:“血耗而散不足,气虚坐卧不安,风邪之症。服四物补心汤。”方用四物汤加茯神、半夏、桔梗、白术各五钱、陈皮二钱、甘草三钱。“产后门”中说:“加味四物汤治新产血虚血晕,冲心昏迷不省。”方用四物汤各一两,枳壳五两。

薛氏在产后补血之时不忘补气理气,因为补血当须益气生血,血生又当理气行血。所以他在“产后问答”中说:“阴血复归之时不忘补气升提。”其又针对产后玉门不敛的情况说:“气虚不足也。宜补中益气汤倍加升麻,又八物汤加升麻。”

参考文献

鲍晓东,方正.中国古籍整理丛书·薛辛·女科万金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15.

许柏泉,马一平. 昆山郑氏女科世医考略[J].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3,9(1): 46~47.

鲍晓东.《女科万金方》版本源流及作者医学思想窥奥[J]. 中医文献杂志,2015,(1):9~12.

马一平. 昆山郑氏妇科二十九代世医考[J]. 中华医史杂志,2000,30(2):76~81.

马一平. 昆山郑氏妇科世医起源和医著考辨[J]. 中医文献杂志,1999,(3):39~40.

一、生平简介

王珪，字均章（一作君璋），号中阳，道号洞虚子，晚年自号逸人、中阳老人，后人尊称为王隐君。平江府常熟县（今江苏省苏州常熟市）人，其先祖由汴（今河南开封）徙居虞城，元代著名医家、养生家。

王珪的生卒年，史籍失载。据王氏著作《泰定养生主论》杨易跋言：“《泰定养生主论》一编，予得之藩参东皋冒公。旧本但称洞虚子，称中阳，竟不知作者名氏。比读鲍庵吴先生集，始知为元之吴人，王均章之书也。其略云：均章名珪，自号中阳老人，生元盛时。年未四十，弃官归隐虞山之下，慕丹术，光邃于医。年余九十而卒。又谓见吴思庵跋。”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后称“大都”（今北京），改年号为“至元”，确定有元一代官制，故谓之“元盛时”。王珪“生元盛时”，学界多定王珪生年为至元元年，即1264年。“年余九十而卒”，提示王珪至少活了九十岁，推之卒年应该在1354年后，即元惠宗至正十四年后。

王珪自幼聪慧,喜好医术,少年时就去各地求医问学,采集秘方。一次路过毗陵(今江苏常州),去拜访友人,正值友人生病,“遂见乐神诸巫,旋舞作茶商水客之鬼,唱幽幽魍魎之歌,彼相夸尚其能……遂委病人在床。中间猥艺难名,甚至幸灾之人,阴托巫鬼,须以太牢。以为讼端,不一二年,间,举丧连讼,家道一空”。这对王珪影响颇大,由此痛恨“仆厮市温走卒之徒,乘急撰造妖言,以伪乱真,欺诳士夫凡愚”,但凡“妖怪不能自兴,必也凭托小人之贯穿”,认为“人之有病,始于不谨摄养,终于惑信妄为”,他撰写《泰定养生主论》时将“刘漫塘尊天敬神碑文”录入其中,以昭告世人信巫信神之害。后来王珪在维扬(今江苏省扬州市)获“驱疟汤”方,在湖广省(今湖北省武昌市等地)得“神妙紫金丸”,洛间(今河南省洛阳地区)得“地扁竹散”。

王珪博学多才,强于医学导引,又擅绘画诗词,更工于鼓瑟琴律。《泰定养生主论》卷十六“驱疟汤”云:至元十五年(1278年),“后数年……余游宦南荒”,“南荒”,即辰州,盖因处于湖南荒僻之处,故有是称。王珪游南荒是因为他因“才异”被征辟为辰州路(今湖南沅陵一带)同知。查考至元十五年之“后数年”,只有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有诏访山林隐逸之举,此时王珪大约才二十三岁。正是在此年,大书画家赵孟頫也被举荐为官,王珪因此而与赵氏相识,得赵氏器重。王珪在辰州任上,以“驱疟汤”治疗同僚疟疾病,随用即效。用随身携带麒麟竭膏等常用方药,随时为人治病,每也大获奇效。

元初是一个尚武的社会,文人的地位并不高。当时将各色人等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包括西域、西夏、回回人在内的色目人,第三等是包括契丹、女真、渤海人在内的汉人,第四等是原南宋境内的南人。第一、二等的上层分子有种种特权,居统治地位,南人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王珪是南人,为官处事每被掣肘,未能施展其才能。王氏晚年在所画《虞山图》上,自题《朝天子》一阙云:“竭来避乖,不觉地三十载。天将图画早晚开,潇洒在幽窗外。珪玉相过,一回倾盖。听鸣榔杂欸乃,老迈快哉!还辙我林泉债。”可见其心情之不顺。

王氏约在三十八岁(1301年)时,在做了十多年辰州同知后,弃官归里,屏绝世累,筑室于虞山南麓,澄心观道,益有所得,题其居名“中阳丹房”。此即后人尊称其为“王隐君”的由来。同时,又攻岐黄利济之道,探究丹术,嗣后又实践辟谷之术,“吾飞金津于肘后,炼玉液于丹田,未尝思忽,皆出自然”。经过埋头钻研,潜心体会,不久就深有所得,认为人所患痼疾皆由痰所致,由此研制成功滚痰丸、豁痰汤、龙脑膏等方,不仅治

愈了自身的病疾,试之他人,亦多获效,被誉为“神仙”。从此远近闻名,求其治病者日益增多。

泰定元年(1324年),王氏约六十一岁,积练日久,植基已厚,把自己多年的养生体会,疗病心得,记载下来,开始了《泰定养生主论》的撰写。直至1338年元惠宗至元四年,王珪约七十五岁时,此书得以刊行,历时十数年。作者自序谓:“始作于泰定改元,又庄子云:宇泰定者发乎天光,故命曰泰定养生主论。庄子亦有养生主论。”交代了题名的缘由。后来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其著作《丹溪心法》中引用了《泰定养生主论》的部分内容——这也是目前可以查证最早引用该书内容的著作,朱丹溪每用王珪滚痰丸治疗痰火、遗精等病。

元惠宗至正十四年(1354年),王珪约九十一岁,于是年或其稍后,卒。其医术传于弟子高敬斋,亦有名于时。

二、生平史料

王珪生平史料见载于乾隆《常昭合志》卷8,人物,先贤传和卷11,艺文;乾隆《苏州府志》卷61,人物15和卷75,艺文1;道光《苏州府志》卷122,艺文1;同治《苏州府志》卷138,艺文3,等。另王宏翰《古今医史》卷7、陈梦雷《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高启《高青丘集》卷20等著作中也可见零星记述。

《古今医统大全》王珪,字均章,号中阳老人,吴郡人。志行高洁,见道真明,尤邃于医学。屏世虑,隐居吴之虞山,人称隐君。所著方书,超出群表。自幼及壮至老,调摄有序,论证有旨。至于诸痰诸饮挟火为患,悉究精详,制有滚痰丸,最神效。有《泰定养生主论》。(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卷一“历世圣贤名医姓氏”)

王珪,字君璋。尝以材异辟同知辰州,辞不起。筑室于虞山之间,澄心观道。善鼓琴,又工画,布置繁密,意趣幽远。号中阳老人(邓赅《常熟志》)。(清·《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四)

《琴川续志》《郑志》曰:珪博览载籍,深于养生之术,注《道德经》,撰《泰定养生主论》、《还原奥旨》、《原道集》、《四书道统》、《山居幽兴集》。善鼓琴,工画,赵孟頫器重之。年九十余卒。(清·陈揆《琴川续志》卷五“叙人”)

《四库全书总目》《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旧本题元·洞虚子王中阳撰。其书论婚孕老幼、阴阳气运节宣之宜,并摘录脉证方剂,以资调摄。取《庄子》宇泰定者,发乎